

社会发展是一项建基于群体的事业

弗朗哥·弗拉罗迪

(罗马大学 社会学系, 意大利 罗马 00197)

摘要: 发展并不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发展似乎离不开来自上层的决定权, 但是, 与此同时, 为了建立全球所有社会成员的协同关系, 来自下层的积极参与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当前主要危机区域的分布表明了这样一种协同的关系的必要性。这种协同关系不能留待臆想的自由市场的自动均衡 (虚假的都市化, 福利国家的衰落, 技术的进步和伦理的倒退)。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A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4) 04-0238-08

发展不是一种宿命的编年史。它不会保证, 随着时间的推延, 繁荣与幸福就会随之而来。除此以外, 发展还是一个多面的概念。它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铺就了通往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场独特的革命, 与实用主义的美国革命 (《不给代表权就不交税》) 相反, 法国大革命是大胆的, 或者简单地说, 是理论重于实际的, 这表现在它看来普遍适用的《人权宣言》: 自由、平等、博爱。然而, Robert Darnton 的研究却有力地说明了“启蒙的事业” (他在这里特指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百科全书派), 事实上可以被合理地看作知识分子的商业冒险, 旨在通过付给作者版税的方式来帮助知识分子以相对自由的行为人的身份而出现在市场中, 使他们最终能够脱离根深蒂固的传统束缚, 能够独立于宗教、经济和政治权力。

我已经在多篇不同的文章中指出, 特别是在《不可避免的进步的神话》中指出, 进步的观念, 而不是把人类历史看作人类文明史的观念, 即把人类历史看作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明以一种所欲求的方向运动的观念, 可以在伏尔泰的《著作》中找到经典表述, 孔多塞则是其最雄辩的宣传家。这构成了启蒙的最重要的观点, 也明晰了人拥有对自我和他的机能 (facultier) 进行掌控的乐观特征, 即一种康德主义的对于成年的自我意识。事实上, 启蒙不过是一种人已经达到了成年的康德主义的感觉, 是一种明确的具有了真正主权尊严的意识。在这位来自格尼斯堡的哲学家 (指康德) 看来, 人并不会就此成为神圣的: 人神将会无所事事, 如同宇宙的建筑师现在无所事事一样, 因为他已经做完了太多。完全的自由将会使人湮灭。人所处的位置是在全部和无之间, 在帕斯卡尔看来, 这个位置是悲剧性的, 但是, 正是这个位置成为具体的、有效的思考的显见的出发点。在康德在此被引述的 1784 年的文本中, 有一点是很清晰的, 即, 人类的尊严意识被看作科学运用理智以解决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现实难题的成果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 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能使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 那么, 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康德的训诫是很清晰的: 勇敢地运

作者简介: 弗朗哥·弗拉罗迪, 罗马大学社会学教授, 著名社会学家。研究方向: 社会学理论。

① 本文系《现代社会学研究》杂志上 2013 年 1 期英文译文。

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

然而，整个启蒙运动中所弥漫的热情却未能真确地反映发展的问题性。在 21 世纪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把发展看作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种一厢情愿，或者说，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幻觉。

经历了标志着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无争议地假设，一个社会可能在技术上先进，与此同时却在道德上落后，饱受小的罪恶以及有组织犯罪的折磨。经济发展不是社会正义的保证。在这方面，危言耸听的马尔萨斯和乐观满满的孔多塞都是错误的。他们的预言仅仅反映了他们个人所偏好的原则。马尔萨斯所预言和恐惧的人口爆炸，可能近在眼前，但是，没有必要援引命运说或者神圣旨意说对之加以解释。很简单，它是人为的。

多年以前我对于出现一个“蚁山社会”的可能性写了很多东西。这种类型的社会首先以尽享优势的都市化水平为标志。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与偏僻的乡村的对照来界定城市。每个城市都被看作或者呈现为居住中心，各自都被包裹在，或者说沉浸在周围的乡村的绿色边框之中。乡村的功能是提供食物，而城市中心则提供高级的服务，从宗教和学术，到政治—行政、警察和金融服务。

与这种田园景观相反，Lewis Mumford 很清楚地看到了从大都市到特大城市再到墓地的戏剧性的依次转变。但是，由于这种看法含有浪漫主义的伤感，其分析性价值因而受到限制。

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墓地的转换顺序，有很清晰的说服力，尽管不会使人心向往之。但是，这种观点过于单线条，不能正确反映历史变化的动荡起伏。这说明，最好的、最精细的分析家也陷入对图式化的热衷以及论战性的傲慢之中。建成的区域的确不足以构成一个城市，城市的形式也的确根据历史背景和社会生产功能而变化和演进。欧洲的城市有围墙；美国的城市则水平展开，向广阔空间开放。

危机有一个重要用处，人们必须对之有所了解。能源危机不仅仅逼迫我们再度发现腿的用处，它还使驱车去远方度假和过周末成为昔日的神话。从速度的迷醉中醒来以后，我们被迫享受安静站立沉思默想的快乐，这也许是更加精致的快乐。它使我们再度发现并欣赏乡村牧师的美德（*stabilitas loci*）。然而，为了这种快乐，我们需要舒适的住房，并不一定是豪华的住房，但应该设计合理。它用臂膀簇拥着我们，我们沉浸在它的怀抱中，如同沉入柔软的丝绒般的山谷，屋外秋雨不停滴落在草地上。

许多城市的新住民不会有这种理想。对这些接受一切的前农民来说，乡村的毁灭，肆意倾倒的水泥，只不过是再增添一些他们自己逾越不了的障碍：他们自己新近的城市化，之前地狱般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的卑贱的、令人屈辱的状况，这种生活的牲畜般的劳作。

乡村—城市的一体化正在一点一点地取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一种公式认为，今天的一体化早在初始阶段就已经被预示了。从波士顿直到纽约和巴尔的摩再到华盛顿的海岸带，或者连接都灵和米兰的目前已经过度拥挤和寄生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或者从东京一直伸展到大阪的工业带在胚胎期都预示了后来的一体化，尽管当时这些地带还十分粗劣，尽管几乎完全缺乏必要的基本的服务结构。

城市人口增长过于迅速。这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还是一个节奏问题。饥荒的幽灵笼罩在“蚁山社会”之上。很奇怪，也怨不得他们，蚂蚁会被变成胃口大开的蝗虫。不会有面包，基本的食物会日益缺少。即使是在现在，这方面的资料也多得惊人。

大约有 6 亿人濒临饥饿，9.5 亿人遭受营养不足。鉴于阿根廷处于危机之中，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大平原目前是唯一的工业化的农业工厂，拥有足够的机器人和计算机为穷国生产谷物。如果美国农业某一年表现不佳，就足以导致谷物的不足，而影响到数以亿计的非洲和亚洲人的日常生活。

巨大的希望被寄托在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之中。人们假设，政治的解放将会容许在当地范围内的经济和工业的全面发展。一旦那些应当倒掉的殖民地政府都倒掉了，一些国家的生产性人类能量就有希望得到释放，并在自由中增长放大，从而导致繁荣和发展。这种说法对于亚洲来说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了，对于非洲来说，这些希望更是无根据的夸夸其谈。殖民地政府的倒台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它只不过会留下一个难以填补的真空。糟糕的是，今后的 20 年内，人们将会清楚地看到，

不给予第三世界国家有效的、非反生产性的援助将导致何种糟糕的结果。

对全体发达世界来说,旧式的对母国的依赖已经被转变为新型的国际性的依赖,这有力地摧毁了旧的平衡,却没有建立一种新平衡。毫不奇怪,传统的农民农业陷入没有出路的危机,饥饿每天都在敲打人们的家门。他们现在已经在品位和需求上倾向那些蹩脚的欧洲制品,却没有自主地进行工业生产的能力。

在今后的20年,人们将注定会日益清晰地感受到城市效应和虚假的工业化的负面效果。与西方世界相比,地方的人民(作者指的是西方殖民地的人民)似乎注定会陷入结构的不平衡之中。他们现在需要产品和西方制品,他们已经不能离开它们,但是却不但不生产它们,也购买不起。

在我看来,有理由指出,如果听凭技术和政治进行自我变迁,将会绝对地或者相对地导致原材料的国际价格的更为严重的下降,从而降低前殖民地国家的国际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饥饿的问题当然不会通过政令和道德呼吁而得到解决。

很可能,人口过剩日益严峻以及沙漠面积日益增长的欠发达地区的饥饿与恐慌之间的联系将注定会越发牢固。

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感动、忧虑还是乐观,今日世界的人口状况都构成了严重问题,不过尚不足以构成威胁。这就是事实。人们已经熟知这个事实了。在灾难预言者方面,我们只需回顾前面已经提到的名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乐观的自由放任者方面,我们只需回顾孔多塞的名字,以及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此外,我们都知道,Cassandras和Polyannas都响亮地表达了他们的满含激情的看法。还有人指出,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还在可能过于严格地遵循圣经的有关人口增长的训示(“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时,古代中国的哲人们就开始考虑通过把大批人转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来更合理地再分配人口的可行性了。

事实是,自从生态学家Paul Ehrlich于1968年出版了《人口炸弹》一书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超过一半。25年前,34亿人住在地球上。2005年,联合国估计有53亿人住在地球上。据我们所知,这是历史上最快的和幅度最大的增长。然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不仅农民跟上了脚步,从1968年到1990年,全球单位粮食生产事实上还增加了10%。慢性营养不良的人数降低了超过16%。这是好消息。但是,重大的警报已经快要响起。

人口增长得如此之快,似乎已经不可控制。据一个可信的然而又可能有些保守的估计,每年有9200万人新降生在地球上。的确,一些可靠数据表明,从1965—1970到1980—1985年间,贫困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了30%。但是,新生儿与去世者之间的平衡却在被扰动着。自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出生的人数比死亡的多了19亿。即使将来的生育率是历史的最低点,今天的孩子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孩子,将会不断代换自己,人口仍将极大地增长。排除不可预知的灾祸,2100年地球上将有100亿到120亿人口。让我们清醒地看一下这些数字,记住今天(2012)世界的居民超过了70亿。

我们离世界人口学方面的最可信赖的权威Massimo Livi所做出的估算已经不远了。根据以联合国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判断,Livi Bacci估计,世界人口将从2005年的58亿增长到2010年的62.29亿;然后,2025年,增长到84.71亿;到2050年,增长到100.18亿;最后,到2150年,增长到115.83亿。这个进程叫人害怕。但是,全球的数据可能会引起人的误解。人们需要分析这些数据,探究这些数据背后的东西。在我的著作《2000年的五大景象》(1985)中,我提出了一些似乎被后续的进展所证实的假设。2012年的现在,世界居民已经达到了70亿。21世纪末,至少60个城市的人口将超过500万,而这些城市的大多数将坐落在第三世界或者第四世界,或者坐落在那些资源—人口的平衡已经遭受严重威胁的国家。孟买和墨西哥城的人口增长率已使它们的居民在20世纪末分别达到1900万和3000万。在今天,污染的程度就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欧洲19世纪的进程当中的所有那些有利于人口集中并使之更为便利的规模经济在这里都已经遭到破坏。在亚洲和拉美,人们更为经常性地看到“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的骇人景象,这是一种都市的堵塞和衰落,是可怜的居住条件,是失业

和营养不良，是犯罪和污染。

面对这个问题，传统的智慧需要得到严格的审视和修正。的确，你总是可以把某种特殊的困难归咎于某事而不是人口过剩。显而易见，人们并不是死于人口过剩，它还只是个抽象的经济和社会学概念。人们死于战争、营养不良和疫病。这些实际上只是直接的、可见的原因。潜藏的不可见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为了消除大城市的拥堵，对人口进行重新分布、调整 and 改变土地使用规则很有必要。尽管对人满怀敬意，但是，我仍需指出，人口过多意味着更多的资源使用，更多的环境污染，更少的生物多样性。

世界是有限的。环境中的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今天的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当前的世界人口增长不能无限地维系下去。地球的资源不仅是有限的，它们已经处于压力之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的观点是，在这个问题上纯粹的意识形态的或者理论的对抗基本上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因而应当避免，尽管这种对抗的用意是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应当积极地思考应当怎么做。如果一种已经不妙的情況由于决策者和高官们之间的误解而进一步恶化，那真是一场悲剧。当我想到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甚至没有提到“自然”一词，我的头都晕了。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联合国的立场与传统态度之间的摩擦，特别是在堕胎和避孕技术的问题上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摩擦。如果能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就可能会打开急需的合作道路。人们可以理解教义和道德原则的重量，但是，道德原则不能被看作或者还原为天上的清谈，它应当与现实的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惧怕现实的污浊，就必然会导致庸庸碌碌和最终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天主教会本身，特别是在约翰二十三世领导之下，经历了严肃的灵魂探索和严格的自我检查。众所周知，生育控制，曾经在 1963 年得到了约翰二十三世所建立的委员会的多数票批准，后来在 1968 年的保罗六世的《人类履历》教皇谕令中被推翻——这种否定立场被约翰保罗二世以越来越坚定的态度所坚持，尽管在地方神父于草根信徒中间的传教实践中官方的教义似乎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如果考虑到联合国关于家庭、堕胎和避孕的文件，天主教会的保守似乎是一件好事情。联合国所明确防范的真正危险，尤其涉及由于秘密的不安全堕胎所导致的妇女与儿童的健康和道德问题。总体上的误解表现为，把今天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计划生育的必要性问题与西方帝国主义复发的危险问题相互转换，或者混淆这两个问题。

所以，每一方应当接受对方的意见的相对可信性，而不应当坚持一种教条的、单边的抽象的立场。当生态学家宣称人口无节制增长构成了对环境的威胁时，他们的观点应当被认真思考。此外，问题不仅仅是来自于人口增长本身。人口增长应当被放到全球框架之中作为多个变量中的一个加以看待，政府应当被说服更聪明地、更有弹性地工作。一个基本的目标，指向由较低的贫困程度所带来的较少的人口出生，而不是由强制的出生减少所带来的较低的贫困。这个目标能够为讨论以及全部所涉及的群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平台。这两个进程的时机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当前起自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世界经济低迷，不应当被看作极度危重的病情表现。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像这样的低迷并不出格，而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生理特征。经过与社会主义 50 年的冷战后以生理者姿态出现的资本主义，在此起彼伏的危机中兴旺地生长。它是一个生产和财富分配的沸腾的、动态的、强劲的非体系化的体系。就生产而言，主要由于科学管理、劳动分工、竞争以及电子设施的采用，资本主义历史性地呈现出相对于其他的体系（社会主义，合作的、国有的以及受控的产业，等等）的确切的优越性。然而，在分配方面，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改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其他相似体系虽然有很好的分配制度，但是足够悲哀的是，它们却缺乏组织和实施生产的有效能力，它们只好分配贫穷。

还有最后一个因素应当简要地思考一下。这就是温室效应，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去森林化的骇人进程。很不幸，去森林化是从砍伐地球之肺——残存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球的沙漠化开始的。

非洲终于似乎开始涌动了。经过了大面积的饥荒和两代人被艾滋病的摧残,经过了地方的和区域的凶残军阀的混战以及北非那些些许仁慈的独裁者的倒台,整个非洲大陆似乎要动起来了。

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表现出显著的突破,尤其是在某些区域(如班加罗尔和上海)。当然还会有严峻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挑战还是让人恐惧的。考虑到美国和欧盟迁延的衰退,而它们恰恰是中国大规模生产的最重要市场,恐惧感就有了真实性。

在南非,艾滋病疫情迫使祖母们照顾起一代孤儿。此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对立。据可靠的报道,在民主刚果饱受战乱的矿产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叛乱分子夺取了 Goma 城,绕过了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击垮了忠于总统 Hoseph Kabila 的军队。叛乱是由一个名为 M23 的派系发动的,造成了数万人的流离失所,救助机构警告说人道危机日益严重。有三个原因导致了刚果难以消除的混乱和暴力。金沙萨的政府对该国东部的控制力近于无,在那里土著和派系的民兵混杂在一起,凶猛地围攻联合国部队。无能的政府加上纪律涣散的军队,导致了多年的痛苦和针对贫民的战争。

在艾滋病疫情方面,众所周知,直到 2004 年,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还不存在。多年之后,这种药物的获取依旧困难。据 2011 年的一项人口统计,当前有 400 万 17 岁以下的非洲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个或全部。城市里的高失业率、贫穷和犯罪加剧了祖母们的困境,她们被迫为大量的孤儿再度承担起母亲的角色。

毫无疑问,非洲是全世界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源泉。它拥有土地、森林、包括黄金和钻石等丰富矿产。但是,要获得一种自我生成的地域发展,挑战依然严峻。它们涉及政治领导、社会稳定,以及底层的人群基本保障和教育等问题。到目前为止,来自联合国和前殖民地政权的援助在总体上看收效不大。

当前的经济和金融衰退正在沉重地打击美国和欧盟,这是在技术和生活水平方面对一些最发达国家的打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总体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尤其令人痛苦。朝不保夕的或者说非永久的劳动合同,日益增加的失业,相对高的通货膨胀率,在侵蚀着全体人口的购买力。特别地,符合条件的人数和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注定会加剧,并最终达到崩解点。福利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尽管有着良好的意愿,尽管在竞选中作出了保证,奥巴马总统将会发现,他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源的支持,但这些资源并不能轻易获得。来自 Omaha 的亿万富翁巴菲特说,他愿意为其出一份力,但是这只不过是善意的话,离他所应做的相去甚远。

在欧洲,法律上界定的应得权利与实际资源之间的裂隙大得惊人。福利国家正摇摇欲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 Beveridge 先生提出了“自愿行动”的理念,旨在弥合社会需要和政府资源之间的裂缝,这种理念似乎指出了走出当前困局的道路。然而, Beveridge 先生的富于启发性的实用主义方案在当下还是远远不够的。应得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在公共健康、就业、生活条件,以及政府对于金融资源的供给等方面的社会权利,它的不足是实实在在的,当前还看不到积极的解决方案。资本主义所隐含的基本原则,即获得最大利润以便尽快尽可能地返还和回报投资,相较于过去程度更甚。社会政策显然已经落在(现实)后面了。它们正在与资本主义的逻辑背道而驰。资本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的 50 年冷战的胜利者,这一点很容易被忘记。

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意味着,直面开放市场中的风险以利润创造为驱动的自由企业。这样才有了在有条不紊的工作伦理制约下的财富生产,储蓄和再投资,一切工作都表达劳动者尊严的定义,以及超越近前的家庭和身边的朋友为集体服务的精神。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产业的世界。但是,产业的进程不仅仅包含着办公室和工厂。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进程。

产业进程对于人类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社会学的专门化,即把它分解成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学(工作的、政治的和文化进程的等等),使社会学失去了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观察的科学视野——它本是概念导向的,但是在一些领域,幸运地具有在经验上证实其有效假设的能力。

由此看来,作为全球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处于以全世界的尺度研究温室效应的有利位置。特别

地，由于其远离任何形式的贪婪和利润的无理智最大化，社会学研究能够确定获得“舒缓生活”——这是一种人性而平和的生活方式，其目的是恢复应得权利与资源之间的平衡——的新途径和总条件。

社会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怎样成为其自身胜利的牺牲品的，其原因又是什么。这种胜利，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许多政治和管理的领袖人物的忘乎所以。过度生产和过渡消费加剧了国家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人们越发感到社会的不公正，社会弥漫着不满的情绪。

有序发展和无节制扩张之间的可悲的混淆，正在威胁到现存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权威科学研究表明，全球温度区区4度的变化，冷眼一看似乎可以忽略，实际上已经是今天的平均温度与最近的冰期的温度之间的差异了。平均温度上升4度，可能意味着欧洲的炎夏，温度会从34度轻易上升到40度或者更高。这就使人们在2060年的1月份可能比在1999年的7月份出汗更多，地中海地区的夏天可能比2010年的俄罗斯夏天更加酷热，而后者导致5.5万人死亡，100万公顷的庄稼焦枯，25%的小麦减产，总损失达到15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1%。降水将会更加频繁，雨量将会格外丰富。海平面预计将会上升差不多1米。诸如孟买和纽约都市中心可能会遭到水淹，就像最近的热带风暴桑迪给下曼哈顿地区和新泽西大部分地区造成的结果一样。

如果人们被迫回答圣西门和孔德的经典问题：什么是工业社会？三重海啸论在今天就仍然有用武之地。

- a) 工业社会是家庭和工作场所相分离的社会；
- b) 在工业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们平等地工作（尽管不同酬）；
- c) 群体与个体之间存在着竞争；
- d) 噬时的，指的是“被出卖的时间”多于“生活的时间”；
- e) 金钱的重要性（“你是被你赚多少钱定义的”）；

f) 工业社会被技术所主导和指引；因此，它是经过了“去魅”的，完全实际的，倾向于把工具价值看作最终价值；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技术，尽管对于物品的生产十分重要，实质上是一种无目的的精益求精——技术虽然能够控制工业社会内部运作的正常进行，但是，却不能表明历史方向的任何意义。

为了看清楚我们定义为社会和自然海啸的那些扰动事件，我们需要的正是一场激进的心理和文化“革命”。那些似乎已经过时或者晦暗的价值和观念到头来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这些观念主要涉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与作为人类行为的导向性理念的宗教和价值观之间的模糊不清的关系。在20世纪末和第三个千年的起点，社会科学家不幸地犯了一个预言方面的大错，这种错误既是理论分析意义上的，也是实际的。他们也许是被西方世界中对韦伯的合理化和“去魅”概念的有缺陷的理解误导了。信以为真的学者会认为合理化以及相伴随的变幻的都市化，如同无情的烙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神圣物的晦暗”，他们不加辨别地假定工业社会已经消解了神秘感。这与实情相去太远。神秘的东西依然伴随我们左右，尽管有时候处于伪装之中。

人们发现，一个矛盾的情况是，正是在技术上最先进的社会，广布着对情感纽带的渴望，以及始料未及的新宗教和新派别的繁荣，更不用说占星术士的回归，以及在总体上具有共同标准的信仰机体的回归——它们是西方的科学传统的一种神秘回声，外在于这种传统，甚至对其怀有敌意。

在科学与作为应用科学的技术至少在三个不同领域——电子辅助通讯、空间探索和生物化学工业——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的历史阶段，理性的计算和技术——科学的进展却越来越遭到怀疑，如果不是被直接地猛烈攻击的话。

联想到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在担忧工业社会里神圣的东西即将寿终正寝，我们有理由感到惊奇。

诸如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 Peter L. Berger, 以及宗教社会学学者 Gabriel Le Bras, 都表达了这种饱含哀伤的观点, 现在我们可以说, 他们全都错了。这是一个诊断性错误, 它是由文化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所说的“民族中心综合症”导致的, 这种病症是一种试图使每一种可能的人类价值都与自己的特有价值相吻合的倾向。宗教由此被等同为具体的教堂宗教。别种文化的价值和宗教信仰被贴上了野蛮或原始迷信的标签从而被一笔勾销。结果是, 人们似乎不可能把宗教理解为对个体的亲密需要和内在冲动的表达。

把教堂宗教与作为个人体验的笃信宗教相混同, 使人们未能意识到, 不仅所预料的“神圣物的黯然失色”没有发生, 相反, 对宗教和群体的需求却日益增长, 可被称作“神圣物的社会再生产”的现象日益增长和繁荣。一个既定社会的发展水平必然与形式万千的观念和神秘的或者宗教的体验成反比, 在今天似乎总体上未得到证实。

所以, 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 在有关人性的价值取向的讨论中, 一个基本问题隐约出现了: 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否存在着普遍的共同立场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性要求显然是对科学的进化进行批判性的检视。直到最近, 科学还被看作能够达到教义性的、非时间性的, 即超越时空的规律——这些规律几乎与“神圣的知识”相等同。而目前, 尤其是在物理学新发现的基础之上, 这些所谓的规律被看作不过是基本倾向, 或者说是具有或然性的规则。

另一方面, 人们不禁会注意到从官僚化的教堂宗教向作为一种亲密的个人体验而经历的个人笃信宗教的转变。在两种情形下——在认为自己不再能够提供绝对的确定性的科学那里, 在放弃了拥有对真理和神圣的垄断性把握的宗教那里, 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汇聚区域, 如果用汇聚点这个词不合适的话。

这里的关键词是宽容和相互尊重。问题已经不再是对上帝的特征和面目的神学的、学术的定义。科学和宗教目前都不对上帝着迷, 它们也没有执著于上帝, 而是执著于上帝的神秘性。而且, 如同 C. P. Snow 所说的, 科学远没有沉湎于对所谓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悠闲阐述, 而是在 Ilya Prigogine 和 Isabelle Stengers 的直接影响之下, 在解决时间维度的难题。因此, 它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社会问题的关联。不用说, 这指出了科学内在的局限性。

我十分清楚, 一些科学家甚至对“科学主义”这个词都不能容忍, 把其批判性含义和最后的内容也丢在一旁。然而, 让人心生疑惑的是, 人们会看到, 却正是科学家, 他们标榜着事实上不可能中立性, 而这种中立性却一有机会就把他们投入专制的怀抱, 同时, 这种中立性也成为科学家“封圣”的基础。当科学家以“纯客观”之名禁止自己的价值取向时, 他就成为某种自我克制英雄的化身, 沉浸在“方法论上的美学”之中, 或者采用曼海姆的定义, 成为一个凡人中的圣人。

毋庸置疑, 作为神圣化科学男女之前提的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形态, 在今天依然盛行, 尽管把科学简单化为弃绝了任何道德意蕴的技术专家能力, 有着极为负面的后果。科学至上的论断似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 它把知识简化为单一的科学知识理念, 即所有可知的东西都必须是可测量的, 或者说定量的。毫无疑问, 自我纠错性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但是, 科学解释并不是生活在历史的真空之中, 也不能与社会相隔绝。人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 即有学校、教师, 信徒的忠诚和背叛——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呈现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内部逻辑。这种进展并不是像科学主义自己信以为真的那样平坦。科学的发展也是科学之外的利益、斗争、谋略、权力和流血的历史。

科学与宗教之间当然存在着不可解除的分歧, 尽管世界宗教的历史——五种世界宗教, 有三种一神教, 即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两种倾向于泛神论的, 即印度教和佛教——绝不缺少战争和流血。但是, 冷静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 科学和宗教共有一种朝向未来和未知的目标。

这就赋予了它们二者一种超越感, 和一种对业已取得的成果的永恒不满足感, 尽管其表现形式和程度在它们那里各不相同。这意味着科学不能将自身简化为科学主义。换句话说, 科学应当明确承认, 量化精确性崇拜既没有耗尽它的认知潜能, 也没有假装自己就等同于全部事实。另一方面, 宗教

应当废止其对于神圣的和崇高的价值的排他性的、独断性的管辖。所以，宗教应当放弃其不宽容的、盲目教条的态度。

最后，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坦然面对。当宗教的社会和政治约束力已经明确萎缩时，与此同时，当科学发展出一种健康的自我批判立场时，技术，即应用科学，似乎正以如此迅速和令人窒息的步履前进，以至于那些针对纯科学的批判性结论和具体发现也适用于它。最近，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一种矛盾性的角色和功能的倒转。Alexander Koyre 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从概略性的世界到量化精确性世界的转变。Siegfried Gibbon 也曾说过，“机械化已经开始发号施令了”。然而，技术胜利的后果如果不是一种溃败的话，它至少也是得不偿失的。

借助其对于科学的有利地位——如果说不是支配地位的话，在今天，技术把自己展现为最终价值本身，而事实上，它应当把自己界定为大体上是工具功能。由于技术在本质上是无目的的精益求精，这种“角色颠倒”反映了一种致命的危险。由于缺乏借以评价其表现的具体目的性，技术的内在局限感被剥除了。它的发展变得横扫一切，无所顾忌。《罗马书》中的经典原则，ne quid nimis，或者希腊人的原则，meden agan，即“什么东西都永远不要过多”，已经被荒废了。这特别表现在两个敏感领域：a) 电子辅助通讯开始侵入隐私，并以这种方式冒犯了人的神圣性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b) 通过生物化学的极致试验，对生命的起源物施加干预。

明白了这一点，一个矛盾就会得到澄清：今天最繁荣的社会，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同时也是技术先进和伦理落后（如果说原始这个词不合适的话）的社会。这种社会以横行的自我指涉和盲目的自我中心态度为特征，而它们将拒斥人类群体和公民社会。

（译者：马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译校：邢立军，深圳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永平